

认识奥斯曼帝国的另一种可能

——评《帝国合伙人：革命年代中奥斯曼秩序的危机》

陈功

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似乎改革派和保守派是先天区分的，是必定要发生斗争的，一个政治人物必然倾向于两方中的一方。这样的历史观忽略了历史人物的实际处境以及派系划分的建构性特征。在雅伊哲奥卢博士的书中，巴尔干地区的地方显贵们可以跟随鲁塞的伊斯玛仪帕夏反对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与安纳托利亚的改革派显贵对立，然而在一年后，他们又陪着支持改革的“旗手”穆斯塔法打进了伊斯坦布尔——那他们到底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在混乱的年代中，实际的政治斗争需要往往优先于改革理想。

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感”逐步提高，这个亚欧交界处古国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中文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译作，查尔斯·金（Charles King）的《佩拉宫的午夜》、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等书籍都让中文世界的读者们更好地了解了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痛苦挣扎直到最终灭亡的过程。不过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国家，它的现代化改革也有100多年的历史，若是仅仅阅读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恐怕不能全面了解帝国的改革历程和现代土耳其的诞生。这样一来，阅读一本描述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现代化改革之时的状况的书籍就显得很有必要，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青年学者阿里·雅伊哲奥卢（Ali Yaycioglu）博士的处女作《帝国合伙人：革命年代中奥斯曼秩序的危机》（*Partners of the Empire: The Crisis of the Ottoman Order in the Age of the Revolutions*）就是这样一本分析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好书。

阿里·雅伊哲奥卢博士是一位学术经历丰富的青年学者。在相当于“土耳其清华大学”的中东理工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拿到国际关系本科学位后，他先后在土耳其的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和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分别攻读历史和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法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前往哈佛大学历史系，在研究古典奥斯曼时期的著名学者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后以博士后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伊斯兰建筑研究和希腊研究。在几次跳槽后，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并于今年拿到终身教职（tenure）。丰富的学术经历使得雅伊哲奥卢博士拥有了比一般历史学家更广阔的视野，从而让他能够避免落入学术碎片化的陷阱（作者指出，这在对17-18世纪奥斯曼历史的研究中相当普遍），向读者呈现出从塞里姆三世上台（1792年）到马哈穆德二世上台（1808年）之间，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现代化改革开始时期的帝国历史画卷。

雅伊哲奥卢博士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梳理了对这段时期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研究情况，虽然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奥斯曼历史中被研究最多的年代之一，但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图景，地方史、外交史、改革史等课题的研究是分裂的。作者的目的是进行一项以这段时期里帝国的制度和话语（discourse）转变为主要关注点的综合性研究。作者在导论部分中介绍了时代背景，标题中“革命年代”指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约是1760-1820年间），当时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为进行军事重组而开展以增加资源为目的的改革，统治阶层与其他集团进行谈判和政权重组，最终导致全方位的重大变革。传统的历史叙事将这一年代中帝国的改革视为最初的现代化尝试，并将地方显贵（provincial notables，这是全书

最重要的概念）和近卫军视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这一历史叙事在60年代后有所修正。作者认为，深陷危机的奥斯曼帝国在当时面临三种改革选择，一是“帝国的新秩序”，即自上而下的集权改革，二是“显贵的秩序”，即中央改革派与地方精英间通过财政、政治和制度纽带进行合伙（partnership），三是“社群的秩序”，即地方社群（communities）自下而上的集体性参与。

第一章《帝国：1700-1807年的秩序、危机与改革》介绍了奥斯曼帝国在17-18世纪间产生的影响深远的秩序变化以及赛里木三世上台后进行改革的背景。15-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本质上是苏丹家户（household）的一部分，地方上的土地被分为“蒂玛尔”（timar）和“宰麦特”（ze'amet），这些土地被封给军官，军官则要在战争时提供军队（sebkan）。到17-18世纪，独立的官僚机构发展起来，地方显贵也越来越多地参加地方治理。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遭受了一系列战败，财政紧张，中央收回了许多蒂玛尔和宰麦特，再把这些土地转包给终身包税人，这些被外包的土地被称为“马里卡内”（Malikane），不受地方官僚的干涉，包税人的义务是提供定额税收，他们往往会再把马里卡内转包给更下一级的地方人士进行管理。与此同时，原有的税收法律体系瓦解，地方各个社群的代表开始在宗教法官辖区（kaza，奥斯曼帝国的基层行政单位）的法庭处讨论税收分配问题，作者认为这让地方法庭有了代表大会（assembly）的性质。同样在17-18世纪，帝国的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成为了政治讨论的场所，同时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青年冲击了现有秩序。在新的城市生活中，近卫军扩大了其影响，成为联系都市诸多团体的一支社会力量。1792年塞里木三世上台之时，中央的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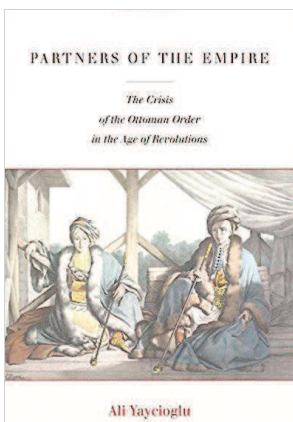
阿里·雅伊哲奥卢博士是一位学术经历丰富的青年学者。在相当于“土耳其清华大学”的中东理工大学拿到国际关系本科学位后，他先后在土耳其的比尔肯特大学和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分别攻读历史和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法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前往哈佛大学历史系，在研究古典奥斯曼时期的著名学者杰马尔·卡法达尔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后以博士后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伊斯兰建筑研究和希腊研究。在几次跳槽后，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并于今年拿到终身教职。

多官僚都认为，军事和财政改革是拯救屡战屡败、国库干枯的帝国的必要手段，但是改革者之间没有具体操作改革的共识，他们也分裂为受不同外部势力支持的不同派别。

第二、三章是对地方显贵和社群的介绍。在第二章《显贵：治理、权力与财富》中我们看到当时以父系家庭为核心的地方显贵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治理，他们被中央派来的官僚任命为副手“受任官”（mutesellim），从事征税等事务，并利用参与治理的机会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作者称其为“治理商业”（business of governance）。他们成为了地方商业的协调者和监督人，取得巨大的财富，并且与基督徒和犹太商人（sarraf）积极合作，在地方上进行放贷。同时，地方显贵大量接收中央政府重新分配的蒂玛尔和宰麦特，将它们变为自己的田产（ciftlik）。此外，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试图通过在叛乱后接受招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显贵家族在地方上的控制是碎片化的、马赛克式的，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其权力和财富的传承也得不到法律的保证。第

三章标题为《社群：集体行动，领导和政治》，介绍了帝国（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基层社群的情况。宗教法庭在18世纪成为了公众参与政治的场所，苏丹的政令在这里被宣读，向上层递交的陈情书在这里被翻译成奥斯曼土耳其语公文，各个社群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税收分配和公共事务，并推选出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的领袖人物阿扬（ayan，基督徒的领袖人物被称为巨头 kocabasi）。帝国在18世纪末的改革中试图制度化这套基层体系。帝国规定阿扬应由地方各社群在宗教法官监督下集体推选产生，并由大维齐尔（类似宰相）最终任命。阿扬制度成为18世纪地方的基础制度，而集体行动成为地方秩序的关键。

在介绍了地方政治的新变化后，作者在全文的第四章《危机：1806-1808年的骚乱、阴谋和革命》和第五章《协议：1808年的〈同盟誓约〉与信托帝国》中详细叙述了地方显贵参与历史进程的具体情况。1807年，改革派苏丹塞里木三世在近卫军哗变后下台，穆斯塔法四世



《帝国合伙人：革命年代中奥斯曼秩序的危机》